

1949 年的“赶考”

□ 史进平

西柏坡的“赶考对”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阳光明媚。西柏坡村前屋后，大大小小的几百辆车从西柏坡村一直延伸到十几里以外的郭苏河滩里……今天，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日子。

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内，一些人已经离开。下午2点30分左右，毛泽东从住了10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到迎上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主席肯定又是一夜未眠，上午才休息一会儿，所以关切地问：“主席，休息好了没有？”

毛泽东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西柏坡时期两位伟人的“赶考对”。这个“进京赶考”，“进京”意味着执政，“赶考”是要接受考验，其中有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未来深刻的思考，也有着在战争年代、在西柏坡时期对“考试”丰富而扎实的准备。

此刻，我们回到70年前，看看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走过的路，重温一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在“进京赶考”前那种充满豪情又自信的心态，还有胜利前谨慎且忧患的心态。

“赶考”路上的为民情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利益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西柏坡时期得到充分体现。

1947年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

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这次会议吹响了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号角，推动各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其势如暴风骤雨，成为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

千百年来拥有自己土地的愿望得到实现，是农民多么高兴的事儿啊！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发展生产。

三大战役在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取得胜利。

毛泽东说：“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在革命即将胜利，新的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更是重视“人民”的作用，他们明白：只有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人民做国家的主人才是“王道”。

于是，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专门作了阐述，指出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这一思想明确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执政理念，为“进京赶考”时为谁执政指明了方向。

“赶考”路上的学习情怀

三大战役胜利后，面对从乡村进入大城市，面对即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艰巨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自己面对着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很多敌对势力说“中国共产党能打得了天下，但是治理不了这个国家”的谬论时，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是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面对我们一直在农村打仗的广大干部士兵，毛泽东提出，要把“战斗队变成工作队”。

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培养既懂打仗又懂经济建设、管理城市等综合多能型干部，要大家学经济，学管理，学技术，学习国内外的一切先进经验。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秘诀，应对任何挑战和风险考验的法宝。

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能力，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创办了大批党校、军校以及各类中等学校，旨在培养大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所需要的高级人才。

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又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了12本必读书目，指出：“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措施使党的干部得到迅速补充，他们在思想、理论和业务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为进城后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也使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

“赶考”路上的规矩意识

面对建国，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的法律。

全面走向正规化，从党的政治生活，到经济建设，到军队建设，到文化宣传等等的各项规章制度，一步步，一项项启动并建立起来。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到西柏坡考察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在西柏坡，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各地加强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以此来树立中央权威。中央

通过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要求各地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同时要求在此过程中，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中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提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要求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

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还要求做到：“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以此来防微杜渐，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些规矩和制度的建立，在党建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这些规矩和制度，有大政，有行为规范，有纪律约束，对于建立新中国的“赶考”新征程，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精神保障。

“赶考”路上的新启迪

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迄今已是70年。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任务，由进京前的“如何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更好地领导建设”转变为当前形势下的“如何更好地长期执政”。回顾西柏坡的“赶考”，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启程，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是对治乱历史的深刻借鉴；是走向执政的铮铮誓言，是永远在“赶考”路上的回眸与思索。

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赶考永远不会结束！让我们继承“赶考”精神，秉承“赶考”之志，永远前行在路上！

（摘自2017年第8期《共产党员（河北）》，原标题为：《回眸：1949年的“赶考”》）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物产丰富的地方。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共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从此这个小山村开启了不平凡的使命。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会合。至此，这个小山村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周恩来将西柏坡称为“我们党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抗战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中国的革命指挥中心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了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判断，做出了“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当天，毛泽东还针对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声明，认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反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占领热、察两省，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

当时的新驻地曾首选承德。承德位于冀热辽与东北的中间地区，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主要通道，与苏联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又是解放区，有利于作为中央驻地。1945年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警备团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准备工作。然而形势的发展却阻断了这一计划，1945年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允许蒋介石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控制。同时，我军10万人进入东北后，也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东北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可能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并控制大城市，所以决定放弃中共中央迁移承德的决定。

考虑南迁淮阴。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曾有迁至离南京很近的淮阴的想法。1945年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谈判，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并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国共双方分别颁布了停战令。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历时22天，经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协议的通过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让饱受战争摧残、渴望和平的人民看到了实行民主政治及和平建国的曙光。

当时的情形让中央认为如果国共关系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国内和平将拭目以待，内战似乎不会再生发，故开始考虑把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认为，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南京，中共中央可考虑南迁，以利于共商国是。当时，淮阴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路交通枢纽，地处华中要地，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通商人和，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斐然，被誉为民主建设的楷模，因此成为中共南迁的首选之地。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无视国内外交舆论，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不断进犯解放区，多次派飞机在华中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和扫射。同时，极力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设想。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1946年6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第三次国内战争

转驻西柏坡的前前后后

□ 冯佳

爆发。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8个月共歼灭国民党部队71万余人，使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随即，改为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面对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1947年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经过慎重研究，作出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到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中央工委最终选驻西柏坡。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后，经过细致的研究与慎重的考虑，决定选择西柏坡为中央工委驻地。当时就选址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要么考虑阜平，要么考虑建屏。阜平与晋察冀领导机关挨着，联系比较方便。而且阜平是个老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但村庄小，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后来，又考虑到建屏县滹沱河沿岸的东西黄泥、柏坡、郭苏一带稻麦两收，经济条件较好，群众基础不错，又是老区，交通便利。但不利的地方在于，日寇烧的房子还没有修复，但它们的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在建屏县选址。西柏坡只有七八十户。目标小，而且居住在一个向阳的山弯里，面前有开阔的河谷平地，并有滹沱河流过。不仅环境好，这里一直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村小、人少，群众基础好，对保密工作有好处。经过实地考察，选定中央工委驻地以西柏坡为中心的附近村庄。之后，中央机关即逐渐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夹峪村等。西柏坡村由于相当部分的房屋被日寇烧坏，现经一个月左右的整修、翻盖后，中央工委即在7月初正式进驻西柏坡。

（摘自2018年第3期《大连干部学刊》）



□ 郭蕊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鉴于“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基于此，系统地制定了涉及党内军内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其中的请示报告制度更是当时从严治党的—种重要的工作方法。

1948年1月党中央发表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其主要目的是让党中央对各地的情况

全面了解和积极指导各地的工作。

随后，2月25日党中央在《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强调了实行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请示报告制度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在城市工作中的运用，确保了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

3月25日，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这是党中央以从严治党为基点，对“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研究，对请示报告制度这一工作方法改进。此外，指示新增了三项制度，包括更加详细地规定了需要报告的内容和方式，促使中央更加详尽地掌握地方的政策及其实行情况，加强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从严治党，树立党中央的权威。这份指示进一步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

6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中指出：“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

6月25日，党中央发布《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更加详实地阐明了请示和报告所涉及的方面。

7月26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务必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并对于未认真履行该制

度，从严治党，树立党中央的权威。这份指示进一步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

6月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中指出：“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

6月25日，党中央发布《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更加详实地阐明了请示和报告所涉及的方面。

7月26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务必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并对于未认真履行该制

度的部门必须说明缘由。

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九月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主要是为了消灭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最后在“九月会议”上为了彻底消除全党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明确规定了中央的决定权以及哪些方面要请示“报告中央备审”，至此，请示报告制度正式建立。

（摘自2018年第9期《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原标题为《重要的工作方法：西柏坡时期的请示报告制度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开端

□ 张福建 宋学民 岳雪侠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任河北考察期间指出：“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仅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不仅是指党中央从西柏坡赴京建国，同时表明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论探索和伟大实践，为新中国的建立坚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开端。

1948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的：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他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

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电影院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542人，其中党员376人，非党人士166人。大会首先由董必武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它虽然是临时的、一个地区的，但是没有民族、信仰、性别的歧视，人民的权利受

到充分的尊重，比资本主义旧民主制度，优越得多。”董必武进而对这次大会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做了高度的概括：“这次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他的讲话，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使代表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即将成立。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定了华北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既是权力机关又是执行机关，真正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原则。同时，会议给了与会全体党员以议会斗争、民主生活、民主手续等方面的实际教育，使全体党员更加明确了党团的作用和纪律问题。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村、县（市）人民代表组织条例草案》和《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草案》，提出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高形式，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就是这种最高形式的体现。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一次民主政治协商的尝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摘自2018年第11期《党史博采》，原标题为《西柏坡时期：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开端》）